

## 主持人语

2019年11月9日，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携手德国赛德尔基金会（Hanns-Seidel-Stiftung），共同举办了第27期“博雅德信工作坊”。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二战之后如何克服历史——德国与东邻的和解及中日关系”。

1938年秋，纳粹德国在英法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苏台德地区，又在一年后的1939年9月1日悍然入侵波兰，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全面爆发。而在两年之前，“卢沟桥事变”也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日的大幕。战争之惨烈、侵略者之暴行，使得这段历史记忆在八十余年后依然如挥散不去的阴云，笼罩在欧亚上空，给民族的自我认同、国家间的和解与区域合作带来了种种不确定因素。

“克服历史”（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是一个特殊的德语词汇，意指二战后德国对于战争罪责与屠杀犹太人暴行的清算与反思过程。“克服历史”意味着历史是困境、是难题，无法简单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但也表达出内心中卸下历史重担的渴望，以及对未来和对“正常化”（Normalisierung）的期待。然而，同属“轴心集团”的德国与日本，在战后对待历史的态度不尽相同。至少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中，找不出可与勃兰特的华沙一跪相提并论的事件。要探究其中缘由，必须综合思想史、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乃至文化心理学的众多维度。但是，冷战与德国的分裂却又使

得德国与其东部邻国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在强调作为欧盟一体化之支柱的德法和解之外，也应对德国在战后与东欧各国尤其是与波兰和捷克之间的和解予以关注。在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日渐盛行的今天，坚持多边主义、国际协作与区域一体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欧盟遇到种种挑战，但欧洲区域联合的实践证明，建基于共同历史记忆基础上的民族和解是构建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德国的历史实践值得东亚思考与深究。因此，在二战的欧洲战场爆发八十周年之际探讨这一复杂而深刻、既关系历史又影响未来的话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毛明超

2019年11月20日

## “博雅工作坊”第 27 工作间

二战之后如何克服历史——德国与东邻的和解及中

日关系

2019 年 11 月 9 日

本期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德语系主任黄燎宇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教授以及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主任刘小熊（Alexander Birle）致辞。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唐利国教授，德国波兰学院院长迪特·宾根（Dieter Bingen）教授，奥地利科学院副院长、维也纳大学历史学系阿诺尔德·苏潘（Arnold Suppan）教授与会并作学术报告。

黄燎宇表示，对于德国人来说，11月9日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1918年11月9日，菲利普·谢德曼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分别在柏林宣布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和“自由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揭开了德国十一月革命（Novemberrevolution）的序幕；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与鲁登道夫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Bürgerbräu-Putsch），想要以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为模板推翻巴伐利亚政府；1939年11月9日，德国的纳粹分子打砸犹太人商铺，橱窗玻璃碎了一地，后人将这一事件称为“帝国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1989年11月9日，东德莱比锡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经济政策，最终引发了柏林

墙倒塌、两德统一的历史性事件，给冷战画上了句号。选择这样一个富有历史重量的日子来探讨历史记忆与“克服历史”这个复杂而又沉重的问题，是主办各方深思熟虑的结果。

黄燎宇表示，今天活动的海报——前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的华沙一跪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相对比所展现的，只是上述棘手问题的一个侧面。从德波关系的历史维度看，201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八十周年、镇压华沙起义七十五周年。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外交部长海科·马斯此前分别专程前往波兰，承认德国的历史罪责，并请求波兰原谅。波兰也有声音呼吁要在柏林的犹太人纪念碑、辛提与罗姆人纪念碑之外，再建一座波兰死难者纪念碑。然而，华沙起义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就连许多德国人也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德波之间的历史纠葛，并不是勃兰特的华沙一跪就能一笔勾销的。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琦教授在致辞中指出，黄燎宇教授对历史上的今天之回顾，揭示出“二战之后如何克服历史”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今已百年有余，百年对于人的一生可能是一个漫长的维度，但在历史上不过是短短一瞬，本次研讨会的主题证明，即便经过一个世纪的反思与沉淀，历史的难题依旧不曾得到解答。历史有自己的困境，也有自己需要面对却无法面对的事实。因此，为了能更好地认识历史、尊重历史，需要区域国别研究院、德国研究中心这样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多元的、跨文化的视角来阐述历史，在还原

历史的同时为现今的人们提供参考与借鉴。

刘小熊致辞时指出，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将欧洲拖入了二战的深渊；而在此前两年，日本在宛平城外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八年抗战就此开始。德日两国都给自己的邻国带去了无以复加的灾难。尽管二者在战后都发展起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对待历史的态度却有极大不同。德国在1945年之后承担起了自身的历史责任，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公民社会，都与邻国实现了和解，这也成为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坚实基础。中日关系却完全不同，始终被历史问题的争议所拖累。直到今天，东京的靖国神社中还供奉着不少甲级战犯的牌位，日本政府对国家的战争罪责含糊其辞，其教科书中对这段历史的描写也常常引起中韩等国的抗议。为了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中国与日本必须化解历史重负，塑造更为互洽、更为交融的共同历史记忆。这将会是一个多层次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新的思考契机以冲破多年来固化的立场与观念，开启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过程，以期将历史的重负置于身后，更好地面向未来。今天讨论德国及奥地利与其东邻捷克和波兰在战后的接触、对话与和解的过程，或许可以为解开中日间的历史心结提供若干借鉴。而鉴于当前日益增长的全球化挑战，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各国间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迪特·宾根教授报告的主题是“德国传统波兰政策与1939-1945年间占领波兰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及共同价值观与相近利益基础上的德波伙伴关系”。他表示，要理解德

国与波兰在 1945 年实现互相理解与宽恕，就必须回顾双方互不谅解的漫长历史，尤其是普鲁士德国自 18 世纪末对波兰的“殖民”政策，反思德国曾经高高在上俯视波兰的眼光。

德国和与波兰直接接壤的普鲁士面对波兰时的优越感，可以一直追溯到 18 世纪。波兰有着近千年的历史，诞生于 10 世纪末，但在普奥俄于 1772、1793 和 1795 年三分波兰之后，作为国家的波兰便荡然无存，直到 1918 年一战结束，威廉德国、沙皇俄国与哈布斯堡奥匈帝国三大帝国分崩离析，波兰才得以恢复独立，重新建国。

在 1871 年之后的德意志帝国时期，无论是在政治决策层面，还是在社会精英的话语体系，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反波兰情绪始终占有统治地位。但在 1918 年王朝覆灭后，“种族的”（völkisch）意识形态，不断增长的宣扬德意志民族优于斯拉夫人和波兰人的种族主义，以及帝国与殖民的政治心态，却并未随之一起消失，而是成为一种历史负担，被政治精英带入了德国第一个民主政体，即 1918 至 1933 年的魏玛共和国。而一战后的德国被排除在《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欧洲政治框架之外，战败与所受的屈辱又进一步放大了对波兰的负面情绪。魏玛共和国不情愿地承认了波兰的主权，而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新的波德边界依旧是以暴力强行划定的沾着血的分界线。在德国的集体记忆中，针对波兰的刻板印象甚至从两次大战期间一直延续到 1945 年后的联邦德国。

老派普鲁士与德国的政治精英所持的反波兰的政治传统，与纳粹德国、尤其是 1939 至 1945 年间对波兰的占领政策相结合，在性质上愈发极端。德国在波兰占领区的政策，

出自传统上的优越感，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性质，其主要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对千百万波兰人的迫害与谋杀，更重要的是一劳永逸地毁灭作为国家的波兰及其基础设施。相比起在西南欧的占领，纳粹出于其种族观念，对东欧国家要凶残得多。直到今天，波兰人的肩上依旧背负着历史的重担：纳粹是在波兰的土地上“工业化”地组织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德国最大的几个集中营与灭绝营，都建在被占领的波兰。德波这对千年来一衣带水的近邻，其地理上的接近在二战期间成了悲剧的根源，进而导致了双方特殊的对立与冲突。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45年（即战后）或1949年（即联邦德国成立）以来的和解与互信政策，意义更非同寻常。两国的和解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又因二战后重建的国家间秩序而不得不面临更大的挑战：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传统对波政策以及纳粹带有种族主义的侵略与占领政策之外，二战后的德国还必须将大片领土划归波兰。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德国需将超过20%的土地交还波兰，近千万居住在东普鲁士的德国人不得不背井离乡，从传统上属于德国文化圈但现如今归于波兰的故乡，迁移到断壁残垣的四大国占领区中。这一决定使得德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负面的波兰形象。

除了历史包袱，德波关系还常常在德国内政中被工具化。从德国的视角看，没有任何一段双边关系像德波关系，伴随着大量的自我批判，对固有偏见的克服，以及具体的放弃。德波关系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受到高度的关注，以至于无论是在联邦德国的政治精英还是在社会层面，保持积极正面的对波关系，直到今天依旧被视为不容置疑的方针。

但必须指出，在 1949 年之后，并没有唯一“一种”德波关系，而是有两个德国和两种对波关系。民主德国在 49 年之后可以说是在“上层”的授意下，主动地寻求与波兰和解，并在国家层面承认奥德—尼斯河边界。不过，这主要源于苏联的指示，而不是政治与社会领域长时间讨论或内政辩论的结果。因此，如果想要关注德波间的“原生态”关系，就必须关注联邦德国自 1949 年之后漫长的相互接近与直面自身历史的过程，但同时也不应忽视民主德国内部的基督教会等团体对德波间的理解与和解所做出的贡献。

市民社会的运动，使德国从六十年代起逐步摆脱了传统对波政策的桎梏。这种和解政策也包括一套符号话语，作为浓缩了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发展的精髓。显然，勃兰特于 1970 年 11 月 7 日在华沙犹太隔都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就属于这种不可质疑的姿态与象征，也彰显出德波关系的特殊之处。这个符号在当今德国被所有支持民主的政党接受，然而在 1970 年却激起了极大争议。《明镜周刊》在 11 月 7 日之后的杂志头版发问：“勃兰特可以下跪吗？”持否定回答的读者比肯定回答的要多 1%至 2%，但双方大致各占一半。同样备受争议的还有勃兰特领导下的社民党与自民党执政联盟提出的“新东方政策”。当时曾有一场异常热烈的议会辩论，涉及 1970 年 12 月 7 日签订的《正常化条约》，辩论的核心包括奥德—尼斯河边界、两德分立的事实以及放弃的大片领土，而条约最终也仅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于 1972 年由联邦议会签署生效。

在二战爆发八十年后，特别是在 1990 年德国结束分裂、



波兰建立民主政体后，可以说德波关系有了历史性的转折。但在理解这段历史时，除了考虑德国的政策决断，波兰对德国的积极回应同样值得关注。波兰清楚地认识到，1949年后实现了民主与多元化的德国已不再是历史上的德国，这样一个新德国正是波兰回归欧洲、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伙伴。对于波兰而言，重要的首先是德国的战略转向，此外还有其自身对德策略思想的变化：波兰不再视德国为“宿敌”，而是要与德国结为战略伙伴。而德国自1949年以来所实现的政治文化的更迭，所建立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型，以及双方市民社会的互相开放，都使得波兰战略思想转变成为可能。

1990年后的德波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与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有赖于德国内政与社会所给予的框架性前提。1990年至2015年，两国对于自由民主制度以及以欧洲融合为导向、以利益平等为目标的实用主义双边关系达成基本共识。两国均视价值观导向与温和的对外政策为双边关系的基础，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波兰，欧洲一体化的宏图都具有优先意义。但是，这并不会消除两国在外交、安全、经济、能源与气候政策等方面的认知差异。虽然双方的政策规划原则上都以合作与伙伴关系为目标，但其出发点并不是某种“前定和谐”，而是迫切地需要调和。当今德波间的积极合作，其先决条件始终是放弃对立、放弃依据邻国的利益来针锋相对地制定本国的政策。尤其幸运的是，德波两国不约而同地将其共同的外交目标（即欧洲一体化）定义为首要任务，并且不认为两国观点具有本质性的、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差异。

过去几十年的德波关系发展史充满了幸运的成分：中世纪结束之后，德国与波兰第一次具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各自的民族国家利益也一同受到欧洲一体化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制约。奥德-尼斯河边界成为了连结两国的铰链，也构建起连结一体化的西欧与已实现独立但尚未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之间的桥梁。只有借助原则性问题上（即欧洲一体化）的共同利益，以及两国边界上的开放与流动性，才能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和扩展。如果没有德波和解，欧盟东扩决无法实现。波兰“回归欧洲”，只有通过德国、携手德国、将德国作为最主要的同盟，才能实现。双方于 1991 年 6 月 17 日签订的《德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定义了两国合作的政治框架，该《条约》共有 38 项条款，是联邦德国签订的最长、最全面的双边合作协议。对德国而言，1991 年条约的核心是保护在波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权利；而对波兰而言，核心则是德国自我承诺要为波兰加入欧盟铺平道路。这是两国政府为了在议会中追求最广泛的支持所着重强调的条款。

20 世纪九十年代的德波关系越发多样和深入，双方都认识到有很多课要补。在《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两国又订立了一系列双边协议，见证了双方政治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扩展与深化。而过去数十年中，德波政治家相互间的姿态与举止又证明了双方具备细腻高超的政治技巧，政治层面的象征与符号实际上浓缩在国家、社会与文化等各方面。例如，德国前总统封·魏茨塞克在十年任期的最后一次出访，是 1994 年 6 月会见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而瓦文萨则借

1994年8月1日纪念华沙起义五十周年的契机，邀请刚刚履  
职的新任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格，作为最重量级的外宾参  
加纪念活动。活动期间，赫尔佐格还会见了华沙起义的亲历  
者，人们曾担心他会“碰一鼻子灰”，但出乎意料的是，当  
年的起义者非常感激赫尔佐格的到访。无论对于幸存者还是  
死难者而言，赫尔佐格的来访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姿态  
和信号，因为这证明了曾参与二战的那一代人也能为德波双  
方的和解注入动力。可以看出，相互尊敬最为重要，并以此  
积累起政治符号与象征的资本。这种资本可以扩展自身的行  
动空间，提高他国的认同感与尊崇感，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  
这并不是一种自我屈服，而是自我解放。在德波的相互接近  
与和解中，这一策略被证实是极为有效的。

德国与波兰的利益共同体与伙伴关系，时常被理解为德  
国充当了波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说客角色。同时，德波两国  
的发展存在着不同步性和不对等性：波兰在经济上弱于德国，  
也亟需补上滞后的民主化与所谓“西方化”的进程；德国属  
于欧元区，波兰则不是；货币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  
双方在欧盟中的地位。倘若这种不平衡一直持续下去，对双  
方都没有好处。但也应看到，波兰的历史导致其对德国仍存  
在不信任，时常觉得自己是双方关系中较弱的一方。2015年  
波兰政坛更迭，法律与公正党赢得大选，雅罗斯瓦夫·卡钦  
斯基取代亲欧的唐纳德·图斯克上台，波兰国内的保守阵营  
声音愈发强烈。他们认为所谓的西方化与世俗化将会威胁波  
兰自身的民族认同，而这种威胁首当其冲来自于以德国为代  
表的西邻。尽管波兰愿意成为欧盟的一员，但欧洲事务的集

体决策又让波兰担心无法坚守本国的立场与利益。近年来的移民与难民问题，尤其是欧洲内部的混乱与不合作，再度加剧了保守派对波兰融入欧洲的抵触情绪，他们更倾向于诉诸本国历史传统以抵御全球化和欧盟对本国自主决策的侵蚀。在这一背景下，波兰对于德国必然怀有戒心，不仅是因为德国在历史上屡次威胁波兰的国家独立，更因为波兰将德国视为欧盟话事人，将对欧盟的不满转嫁到德国身上。在法律与公正党执政的最初几年，波兰甚至不认为德国是其最重要的政治同盟，仅仅是最大的经贸伙伴而已。

进入 21 世纪，德波关系又因为若干国际热点问题而偶陷冲突。例如在伊拉克问题上，波兰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支持国际联盟出兵伊拉克，德国政府则很早就表达了反对战争干预的立场。其次是被称为“可见的符号—反驱逐纪念中心”（Sichtbares Zeichen Zentrum gegen Vertreibung）的项目。部分德国组织曾积极推动在德国建立一座纪念 20 世纪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们的文献档案馆，馆藏包括纪录 1945 年后东欧各国强制驱逐的约 1500 万原德国人或德裔少数民族的文献。但在绝大多数波兰人看来，这是德国历史修正主义在进行另一种叙事，反过来要给波兰提要求。第三个争议话题是“北溪”（Nord stream）俄欧天然气管线系列项目。该项目之所以在德国与波兰国内引发强烈质疑，是因为舆论将之视为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布局，既没有遵循经济逻辑，更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此外因涉及对俄经济与能源依赖，也会让波兰尤其敏感。

尽管德波双方存在分歧，但在当前欧盟面临种种困境时，

这种分歧并没有削弱德波双方对于一个经济上有力、政治上稳固的欧盟的共同追求，也没有影响两国实现共同的安全与能源政策的努力。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在“欧罗迈丹”（Euromaidan）还是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等热点事件上，柏林与华沙的研判、决策、采取的行动都相互趋近。双方利益与政策的高度一致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此外，两国间还有着广阔的共同利益，双方政府也通过一系列政治姿态维护这种紧密的双边关系。因此，虽然常有人唱衰德波关系，但我们依然应当有恰当的乐观态度，相信两国间能够实现稳定且共赢的局面。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前近代东亚地区的历史纠葛》。他首先简要地概述了日本战后拒绝反思的原因。在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看来，日本战后不道歉，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明治维新。这场维新运动为东亚带来了近代化的曙光，也因此成为之后所有战争的源头。按照沟口雄三的逻辑，否定战争就是否定明治维新。另一位日本学者竹内好则认为，帝国主义不能裁判帝国主义，美英等战胜国和战败国日本均奉行帝国主义，只有胜败之分，而无道德高下之别，因此不存在评断甚至制裁日本的道德基础。

韩东育认为，我们对于东亚各国间错综复杂的历史纠葛，不能仅作浅表的了解。当今东亚各国横向（即国际关系）上的不和，根源是纵向（即历史）上的不睦。若要真正理解目前东亚各国间的博弈，就必须回溯其历史根源。他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大陆与台湾学者对藏有近五万典古籍史料的日本水户德川博物馆所存历史文献的研究成果。简单来说，东

亚各国在前近代的相互关系迥异于当今。前近代的东亚有自身的价值体系，但也有与近现代不同的争论。近现代东亚各国争论的是谁更像西洋、更像法治，前近代则争论的是谁更像中华、更像礼治。以“中华”为核心的礼治体系与“华夷秩序”，曾经支配过东亚地区，这其中有文化纽带、地缘政治与经贸关系，但总体上都以中国的价值为尊。

从水户藩所藏的资料可以看出，日本在前近代即有取中国而代之、成为东亚中心的野心。水户藩藏有写本《右武卫殿朝鲜渡海杂稿》，收录日本渡海僧天荆在天正年间（1573-1592，即明朝万历年间）出使朝鲜的经历，作于“壬辰倭乱”（万历朝鲜战争）之前。由于宗教关系在政治往来断绝时亦可以保留，所以东亚地区常有僧人互访，既是文化交流，又负责搜集情报。天荆在《杂稿》中曾纪录一则轶事：有朝鲜人“出高丽新扇求诗，余即走笔戏题曰‘迎秋怜婿女，题句笑苏公。扇是三翰扇，风应日本风。’”韩东育认为，诗中“翰”通“韩”，“三韩”即马韩、弁韩、辰韩这三个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国家。其意不言自明：此扇自然是朝鲜所产，但理应奉日本之风。日僧天荆写这两句诗，一是借此展示其学识胜朝鲜一筹，因为在以“中华之礼治”为上的前近代东亚体系中，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始终压日本一头；二则借此暗示，朝鲜现在应改换门庭，奉日本为尊。水户藩中另藏有一首诗“万叠青山客杯底，一时吞却尽三韩”，指的是杯中酒倒影青山，若是一饮而尽，仿佛是将河山也一口吞下。不言自明，这是要整个并吞三韩（即朝鲜），表露出日本战争野心。另有收藏于水户德川博物馆的

《征韩伟略》，其中辑录丰成秀吉令朝鲜使臣转交致朝鲜国王的信（即《日本国关白秀吉奉书朝鲜国王阁下》），信中用“阁下”、“方物”、“入朝”等词，引起朝鲜方面不满，因为“方物”指地方上供的特产，而“入朝”则指地方前往中央政府觐见，如此遣词意味着日本将朝鲜视为己之藩属，通过外交称谓的变更突出权力的从属关系。

朝鲜由此判断日本恐以准备侵略，事实果然如此。记载战事进程的《朝鲜物语》中记录了丰成秀吉的战略预想：他希望以朝鲜为跳板，攻入明朝，将天皇请进北京，将大明四百县分封给手下，然后挥师南进，进攻印度。在这一构想下，进攻朝鲜便无须更多理由了。在“壬辰战争”中，日本出兵十六万余，朝鲜人死亡十八万五千七百三十八人，大明两万九千余人，明朝与朝鲜共阵亡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五十二人。之所以有如此精确的统计，是因为日本当时将死者的鼻子割下，一一清点。这种对数据精确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是今天日本“以定量代替定性”，对南京大屠杀的叙事提出种种质疑的理由。这二十一万余个鼻子，埋在今天京都东寺附近的“耳鼻冢”。每年都有来自朝韩的祭奠者，白衣素缟，而百米开外，便是供奉战争罪魁祸首丰成秀吉的丰国神社，日本青年正在此处拍摄婚纱照。大哀与大喜的极端对立，预示着这两个民族间的情感与历史纠葛。

战争结束后，日本虽与朝鲜缔结和约，但并没有愧疚或道歉的意思。朝鲜则向日本派出使臣（称“通信使”）。使臣入日时，骑马乘轿，极为讲究排场，而前来迎接的日本人则赤足步行。这体现了日本平民对朝鲜的尊敬，因为朝鲜更贴

近中国（大明）文化。朝鲜使臣所递交的文书，落款并非其名，而是解释其名的字，这引起了日方的不满。因为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规则，君父面前需称己名，在平辈与下级面前才可称字。日方认为，朝鲜使臣以字而非名自称，是在否认日本更高一级的地位。日方有意表示不解，实际上正是借此向朝鲜施压，要求其奉自己为“君父”。朝日在称谓上的纷争，其原因在于“礼制”规则带来的国际地位问题：朝鲜自认与日本平等，均奉中华为尊；日本则一心想迫使朝鲜承认其“上国”的地位。

从战国时代开始，日本就蠢蠢欲动，意图挑战中国在礼制上的中心地位，将朝鲜等纳为其藩属国。“脱亚入欧”后，日本自恃开启了西化与现代化进程，欲更进一步，取中国而代之。日本在东亚近现代史上的一系列战争，都是为了实现其对传统国际秩序的颠覆，如吞并朝鲜与琉球后，日本均采用册封的方式，取代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

韩东育指出，对近现代东亚国家间关系的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战争，也应关注心理上的纠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日本互为东亚的两极，互相博弈，因此对未来有任何盲目的理想主义是不可取的。战争所造成的物质损伤容易恢复，但心理上的纠葛却易结不易解。东亚三国尤其是中日关系的历史纵深，决定了区域国际关系无法套用简单的理论，东亚的复杂性正在于此。尽管我们都希望日本在战后罪责反思上能向德国看齐，但日本肯定不会这样做，个中缘由就在于东亚的历史纠葛。

阿诺尔德·苏潘教授的报告聚焦“错综复杂的德（奥）



捷关系之历史背景”。他首先引用了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 1941 年出版的个人最后一部著作中的重要论断：历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历史进程，只有在理解之后，才能评论、质疑或批判，而理解的前提则是充足的信息。而要理解德国、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相互接近与和解的过程，就必须先回顾德国与捷克纷争不断的历史。在苏潘看来，当今德、奥、捷关系的政治历史论争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波西米亚地区，曾存在所谓的“德捷冲突共同体”，即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以及奥属西里西亚。二是在 1919 年 9 月，一战中战败的奥地利与协约国签订《圣日耳曼条约》，该条约与《特里尔条约》一起将哈布斯堡王朝拆分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罗马尼亚，以及新成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王国，还有一部分领土则割让给了意大利。三是德意志帝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于 1938 年 9 月签订《慕尼黑协定》，决定将德捷边境上以德意志人为多数的苏台德地区划割给大德意志帝国（奥地利已于同年 3 月被德国吞并）。四是希特勒于 1939 年 3 月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建立起傀儡政权“德意志帝国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及德国在二战期间对捷克的军事统治。最后一个问题是 1945 至 1947 年对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强制遣返与驱逐。

关于第一个问题。1867 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历经 30 多年发展成了相当现代的多民族帝国，无论是德意志人、捷克人、波兰人还是南斯拉夫人，各民族原则上在行政管理、司法裁判与学校教育等问题上拥有平等的权利。但同时，这

个多民族国家也因此形成了分裂。例如，学生严格按照母语被分到不同的学校，其直接后果就是不同族裔语言不通；经济上也采取若干隔离措施，如德语顾客只去德国商店，捷克语顾客只去捷克语商店。不过，尽管有种种隔阂，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内部依旧存在不同族裔间的合作。

苏潘指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必须追问：当初那些推动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者，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是在维也纳的帝国议会或布拉格的州议会里高谈阔论的政治家，是报道每一场争斗却对合作只字不提的媒体人，是宣扬民族观点的教授，是在法庭上强令人们说德语或捷克语的法官或律师，或是宗教人士。但在酒馆老板中却找不到民族主义者，也几乎没有奉民族主义为圭臬的医生、工程师或是铁路系统的公职人员。对于他们而言，顾客所属的民族并不是决定其工作内容的因素。在理解历史的过程中，必须在宏大叙事之外考虑具体个体的思想与意图，才能把握推动历史进程的社会潮流。此外，在一战爆发前，波西米亚地区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富庶的领地，其经济甚至比奥地利或巴伐利亚都要发达，但一战期间日趋尖锐的民族斗争，以及其后的纳粹统治，都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发展。

关于拆分哈布斯堡王朝的《圣日耳曼协定》。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争议在于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究竟应归属奥地利、德意志帝国，还是应留在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巴黎的捷克代表强调，苏台德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捷克共同体，捷克人与德意志人在这里和睦相处（尽管这并非事实），同时捷克也需要这一块经济发展强劲的地区。协约国认为，奥

地利离得太远，又不能将苏台德地区分给战败的德国，于是就不顾三百万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反对，强行将苏台德地区并入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这就为日后留下了隐患。1938年，希特勒利用了这种不满，以此为跳板，完全吞并包括捷克在内的整个波西米亚地区。原因很简单，希特勒觊觎波西米亚成熟的工业体系，包括当地的军工、钢铁工业，以便增强德意志帝国的实力，为战争做好准备。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半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所有武器装备、黄金和外汇储备都被德国尽数收缴。从数据统计上看，在1941年进攻苏联的德国军队中，至少有十个师装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坦克、重炮、机枪不一而足。

关于英法德签订的绥靖条约《慕尼黑协定》。希特勒为何能够赢得苏台德德意志人的民心，让他们加入大德意志帝国？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经济危机导致的大规模失业潮。苏台德地区的工业以消费品、纺织品、玻璃和化学制品为支柱，当地还有卡尔斯巴德等众多知名的疗养温泉，旅游业也相当发达。但在经济危机中，苏台德地区受到严重冲击，无数人失去了工作。1933年，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失业率一度达到30%，高于德国（25%），奥地利（22%），更是三倍于捷克斯洛伐克（10%）。这导致了苏台德德意志人的不满，他们于是转向求助希特勒。希特勒当然求之不得，立即在张伯伦和达拉第面前打出了这张民族政治牌。但必须强调，苏台德地区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希特勒的主要关注点，他眼中始终紧盯着的是苏台德地区的工业潜力。

关于“德意志帝国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慕尼

黑协定》给捷克社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以至于 1945 年后，许多捷克人在谈起纳粹德国的统治时，首先想起的不是“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而是“慕尼黑”。甚至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慕尼黑”依旧是弱势政府因为害怕战争而屈服于外敌的代名词。然而，即使是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还是无法阻止纳粹德国在 1939 年 3 月 16 日建立“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希特勒本人甚至于 3 月 15 日夜亲自抵达布拉格，要求国务秘书迅速制定出保护国的法规。起初，这部法规在外界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借鉴的是 1881 年法国在其保护国突尼斯订立的法律。但这不过是无害的表象。保护国逐步被党卫军所统治，由苏台德德意志人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出任国务秘书，负责经济事务的是纳粹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他通过“帝国工厂”（Reichswerke Hermann Göring）将捷克多座重要的军工厂收入囊中，其中就包括当时生产重炮和坦克的斯柯达工厂（Škoda-Werke）。希特勒同时下令关闭捷克所有大学，大多数捷克学生在此后 6 年中都无学可上，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学中继续修习农业、采矿冶金或建筑学。

对于统治保护国而言，重要的是参与战争经济生产，这与纳粹在波兰的统治有很大不同。纳粹在捷克建立的政权并不是以灭绝为目的，而是为了让捷克的工农业、捷克的工程师、管理人员和劳动力服务于德国的战争机器，而捷克人也的确完成了纳粹分配给他们的目标。据统计，1944 年的德国战时经济约有 10%是在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中生产的，这是由于当时的西德被盟军轰炸的面目全非，但保护国境内

却很少遭到空袭，盟军想要保护捷克的领土。当然，纳粹在保护国的政策也有血腥的例外，这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当地的残暴统治有关。1941年9月，希特勒将海德里希派往保护国，命令他镇压捷克境内开始露头的反抗和起义。海德里希甫一上任，就下令处决了数百人，包括反对派、前军官、知识分子等等，他还制定了压迫、屠杀乃至将整个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地区“日耳曼化”的计划。海德里希希望将所有犹太人以及反对纳粹统治的捷克人向东驱赶，即驱逐至俄罗斯腹地，直至乌拉尔山地区，并在这里实行“灭绝计划”。而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于是在1942年5月派特工暗杀了海德里希（即“猿人计划”）。希特勒对此进行了血腥报复，约两千捷克人惨遭毒手，两座村庄几乎不复存在。

关于对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强制驱逐。大多数捷克人一般都将之理解为对保护国的统治，甚至是对《慕尼黑协定》的报复。捷克流亡政府曾制定了将德意志人迁出苏台德地区的详尽计划，1942年得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支持，1943年又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斯大林的支持。1945年8月的《波茨坦协定》规定，要将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境内的德意志人有秩序而人道地转移出境（这当然只是安慰人的委婉说法罢了）。战争一结束，捷克就开始了对其境内德意志人的第一波大规模驱逐，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地区共有近三百万德意志人被迫离开家园。驱离行动很少有组织或秩序，且从来不人道，很多人是在凌晨被人叫醒，被粗暴地要求在半个小时内收拾完毕上路。在这一波驱逐潮中，大约有80万苏台

德意志人被赶过德捷边境，发配到美占区的巴伐利亚或苏占区的萨克森；约 25 万人逃亡至奥地利，而奥地利又在苏联的压力下将它们继续转移到巴伐利亚。

主要的驱逐行动发生在 1946 年，给苏台德德意志人留下了难以释怀的梦魇。而被四大国占领的德国与奥地利一开始对待他们根本算不上友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来自苏台德地区，而是因为食物供给有限。苏联元帅朱可夫原本不愿接纳任何苏台德德意志人，只是必须服从于斯大林的命令。

1945 年后的德捷或奥捷关系几乎和德波关系一样糟糕，几百年来建立的关系几乎完全断裂。但自 1948 年 2 月起，一道“铁幕”在欧洲徐徐降下，造成了自 10 世纪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局面。这是一道真正无法穿透的边界，分隔开家庭，割断了近邻，让数百年来相互合作的地区只能望墙兴叹。幸好，这道布满铁丝网、地雷阵和瞭望塔的边界在 1989 年 11 月轰然倒塌。1989 年 12 月，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两国外长共同跨过这块曾经的“铁幕”，这对于居住在边境附近的人们来说不啻于一场解放。然而，波恩和布拉格依旧相距甚远，不单是因为数千公里的地理距离，更因为双方分属北约和华约两个不同的军事阵营，也分属于欧共体和经互会。在剑拔弩张的冷战气氛下，曾流传着华约应对欧洲下一次大冲突的战略：捷克军队应以装甲集团军进攻巴伐利亚，挥师西进，直抵莱茵河流域，随后南下进入法国的勃艮第地区；如有必要，则应使用战术核武器。当时的德捷与奥捷关系也因此一直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尤其是当 1968 年 8 月 21 日，华约军队开进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让德国人与奥地利

人不由地感到恐惧，人们害怕华约军队会继续往德国或者奥地利进发，奥地利政府甚至严肃地考虑要将整个政府暂时西迁。

到了 20 世纪七十年代，布拉格与维也纳和波恩的关系更为正常化。西德和奥地利的电视台在民众间创造了一种期待相互接近的氛围，但政治上依旧困难重重，双方还是解不开《慕尼黑协定》的心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德国声明《慕尼黑协定》从签订之日起无效，但德国政府却表示，《协定》还包括不少涉及私法的内容，例如婚姻、继承等关系，因此无法一废了之，只能从现在（即 1973 年起）无效，双方最终妥协。奥地利则在 1974 年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赔偿协议，但赔偿对象却不涵盖苏台德德意志人，因为他们无权提起赔偿要求。

尽管双方在历史记忆上仍有争端，经济往来却日益紧密。大量德国企业在捷克投资，例如大众集团就收购了捷克知名的汽车制造商斯柯达，而近年来，捷克在德国与奥地利的投资也越来越多。然而，经济上的良性互动并不会让历史问题完全沉默，德捷之间还有一些争议，需要之后的世代通过对话与合作来化解。

唐利国教授最后作了主题为“中日和解的历史省察”的报告。他从日本思想史角度出发，指出中日和解之所以举步维艰，从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他表示，日本相对缺乏反省历史的意愿，这其中有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常见的解释有两种。其一是日本的“耻感文化”，怕丢人、不愿认错，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

在《菊与刀》一书中曾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其二则是政治因素，主要是因为冷战期间美国的全球战略考量。一般认为，政治因素比文化因素更为重要，但文化因素依旧值得研究者关注。

关于日本战争责任的研究，战后日本有许多进步学者作了相当多的努力，甚至可以说，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的分析与研究，时常较中国学者更为细致扎实。然而，在一个由选举产生政府的社会中，即便学术研究对战争罪责已有相当清晰的认知，但若执政党长期坚持对历史记忆的保守主义塑造，那么可以断定，日本民众所应负担的责任实比一般所设想的更大。日本学者高桥哲哉在《战后责任论》一书中，分析了日本在战后从未有过自我审判，始终在逃避战后责任。冷战时期的日本受国际形势所迫，没有面对自身的战争责任；冷战结束之后，之前积累的问题一并爆发，周边国家不断要求日本赔偿、道歉、赎罪，但日本对此一直不冷不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相对还算积极，如时任首相村山富市曾在199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发表“村山谈话”，对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与歉意。但进入新世纪后，以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内阁为代表，日本对战争罪责问题一直持消极态度。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出现变化。自2003年起，中国的GDP逐渐超越日本，使得日本开始具有危机感，甚至有分析认为，日本之所以要在2012年单方面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就是担心在中国完全崛起后无法“保住”钓鱼岛。



从中国方面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恕道”，蒋介石在其战后演说中也曾提到要对日本“以德报怨”。当然，政治考量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或许可以说，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人并不觉得日本是多大的威胁，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中，日本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小国，反之日本也可能具有同样的心理。一般文化史叙述都会强调日本与中华文明的亲缘关系，但依旧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日本历史学者井上清却认为，对中华文明尤其是铁器、稻作与儒家文化的接受，使得日本人民走上了一条艰难的自我解放的道路。何出此言？这是因为当时接受先进的中华文明的是日本精英阶层，其接受是有选择、有控制的，这就导致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差距愈发增加。例如当铁器传入日本后，即被上层阶级所垄断，只有为贵族服务的佃农才有可能接触到铁制农具，而下层民众只能以木质或石质工具与之竞争，因此毫无胜算。在战争中便更是如此。来自中国文明的恩惠可能导致技术的垄断，进而造成社会分裂。这就导致了日本在面对中国文明时的某种扭曲心态：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小国，一方面又把大小观念转变为价值观念，从而生成某种自卑，更要寻找面对大者的优越感。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倒错。

日本在“文”上不如中国，甚至可能还略逊朝鲜一筹，因此它希望用“武”取代“文”的价值。例如丰成秀吉认为明朝是长袖之国，在东亚的通用价值“文”上确实独占鳌头，但“文”同时又让人联想到文弱、虚势与软懦，日本要反其道而行之，成为“武”国。因此，日本有很强烈的武国观念，重视军事价值、重视武勇。这一价值重心具有极强的连续性，

一直延续到近代，使得日本更容易接受并转向军国主义，也让日本在战后很难从价值观上真正否定战争的意义。可以说，文化心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日本的价值观，给日后的中日和解造成了若干负面影响。

不少研究证明，尽管日本的确曾受儒学影响，但儒学的普遍观念并未真正深入日本。日本更突出的是自己的特殊主义。比如在中国的“礼制”体系理念中，君主是“有德者居之”；日本的天皇则是“万世一系”。也就是说，日本从理念上认为相较于“德”，血脉主义才是更好的价值依据，并以此推出其优越感：“万世一系”避免了改朝换代带来的政治不稳定。但这种特殊主义的优越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自我满足。例如日本和朝鲜之间原本是平等的外交关系，但日本在国内宣传中，刻意将朝鲜塑造成“下国”，以此宣扬自身的“上国”地位。但进入近代，日本经历了重大的转型期，切换发展方向，接受西方标准，而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深度接受东亚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价值体系，才导致这种转变显得轻而易举。

唐利国提出，日本面对中国时的文化心理因素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是缺乏普遍规范观念，缺乏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哲学思辨，因此更倾向于以特殊主义标榜自身。有观点称，日本之所以数百年来有热衷于血腥暴力的文化表现，其原因在于，尽管近代日本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确实有尊重生命、尊重女性的表达，但却并未形成普遍规范。日本人能够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人道的价值观念，并在大众娱乐中纵容色情与暴力，在不同的领域使用不同的价值标准。因为缺乏普遍

规范，从而缺乏普遍道德，所以在讨论战争责任时，日本时常运用道德相对论。例如日本国内常有声音认为，日本士兵的确侵略了亚洲其他国家，但却是为国家、为天皇而死，因此理应受到日本国内的祭奠。侵略的罪恶与“为国捐躯”的“英灵”这两种矛盾的道德形象，在日本的历史阐释中仿佛是一个合乎情理的统一体。这会让习惯非黑即白的中国人感到无所适从。

第二个特点是缺乏主体性与责任感。就普遍大众而言，缺乏对普遍道德的皈依，很难形成真正具有独立判断力的主体性。泛泛地强调民族特殊性与优越性，恰恰是个体责任意识不足的表现。应当意识到，日本之所以不道歉，在种种政治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文化心理理由，即日本并未觉得自己有任何过错、更不觉得自己需负任何责任。战后的日本是和平主义国家，但这样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的国家却对自身的战争责任如此宽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日本反战运动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在和平主义教育中，日本也会强调自己受害者的身份，由此突出战争的残酷，但却对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原因只字不提，仅仅是像描述自然灾害一样去描绘战争本身的残酷。可以说，日本的和平主义教育虽然成功，但在认识战争责任上却是相当失败的。

以上两种文化心理因素在国际关系上也有所表现。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指出，日本若要适应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确需要打破旧有的“华夷观念”。但如果像著名的脱亚入欧论者福泽谕吉推论，认为日本应像西方人一样对待亚洲，

将朝鲜等其他亚洲国家当做殖民地，那就很有问题。丸山真男认为，早期的福泽谕吉的确曾将个人的独立自主、各国间的平等与国际关系秩序合为一体，形成了启蒙主义式的理论，但他很快也开始提倡国权论，认为自由平等虽是“经道”，但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日本必须采取“权道”。换言之，福泽谕吉在普遍国际关系的分析中的确承认各民族的平等与自主，但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却轻易背离了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对普遍道德和价值判断的放弃。从这个角度看，战后的日本一方面坚持和平教育，一方面却又不认为自己应负战争责任，就显得并不那么奇怪了。

唐利国认为，总体而言，中日关系在短期将会向好发展，这与中日所共同面对的经济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有关联，也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关系。国力的上升会增强中国人的自信，而中国又是一个相对容易宽容他者的民族。可以说，在日方尚未表现出十分恳切的和解姿态时，中方就已有表达宽容的政治选择。不过，鉴于上述结构性的思想史问题，中日间的真正和解恐怕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实现。因为中国除了“恕道”更有“直道”——“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因此要“以直报怨”，这也是孔子的教诲。或许在未来，文化问题恐怕还需要通过政治解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结构性的和解困难更凸显出学术研究的价值，即政治共同体的建设可能困难重重，但学术共同体的实现交流却更容易成功，各国学者间的理性交流也更容易达成共识。这也是我们着力国际化的区域研究的原因。

本期研讨会吸引了近百位来自首都各高校的师生及德

国、波兰等国的留学生参加。主题报告后，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德国战后外交政策、欧洲一体化进展、中日合作等问题与到场听众进行对话和讨论。